

自然流程中的戊戌变法

□ 朱宗震

内容摘要 历史学专业，应该考察历史事件的自然流程。戊戌变法，是在王朝崩溃时期，希图实现现代化转型的一场稚嫩的启蒙运动。中国因为自大，文化保守，缺乏现代化变革的人才储备和知识储备，维新派因为国家危机仓促上阵。革命派与维新派是孪生兄弟，和平改革和暴力革命，在他们之间多次互相转化。他们的现代化知识很幼稚，也很可笑。他们在士大夫中间的动员，既无法挽救一个王朝的崩溃，也无法完成国家的整合。整个社会重士轻商的风气没有改变，现代工商业也没有发育壮大，自然难以依靠现代化转型完成国家的整合。这是一个自然的流程。

关键词 自然流程 王朝崩溃 士大夫动员 现代化转型

作者 朱宗震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。（北京：100006）

历史学者的方法论

对戊戌变法，政治家有自己的解读：资产阶级改良主义。政治学家也有自己的解读：改良的社会成本，要大大低于革命。文化学者也有自己的解读：谭嗣同的文化激进主义导致了严重后果。当然，社会学者、人类学者也会有自己的解读。人们的价值观不同，知识结构不同，解读是多元的。

历史学者应该有自己的专业解读，但历史学者往往是经验型的，也就容易追随其他学派，尤其是时髦学派。历史学者没有其他学派的专业理论特长，但我们有自己的专业特长。任何非历史学派的专业解读都有片面性，因为他们不熟悉复杂的历史环境。历史学者作为个人，当然也会片面解读；但如果历史学者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，就可以缓解其他学派的片面性。学术界不需要一派独霸，而需要相辅相成。什么是历史学者的专业解读？那就是把历史看

成一个自然流程，某一历史事件，只是历史自然流程中的一个环节而已。

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历史演变中的一个环节，也是人类全球活动在中国的一个环节。它的成因和变化，如同大气环流一样，由复杂的因素构成。抽掉了任何一个重要因素，它就会发生不测的变化，依照现代科学水平，没有人有能力证明由此发生的变化轨迹。例如，我们预测台风，本来是向西北方向移动的，怎么突然转向正北方向了呢？原来有一股气流没有观察到。如果中国旁边没有日本，当然也就没有戊戌变法。如果日本不是一个世界上最善于向先进文明学习的国家，先学汉学，再学兰学，当然也不会有戊戌变法。如果美国、英国的殖民势力，晚10年进入日本，当然也不会有戊戌变法。当我们无法清楚地研究透彻大气环流的时候，我们的方法，首先是承认和客观地观察它的生成过程和动向。历史学者考察戊戌变法，首先就是要考察它的自然流程和我们眼下能够考察清楚的相关成因、流向及其素质。这是历史学的专业，不是其他天马行

[56] 汤象龙.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.北京:中华书局,1992:69、74.

[58] 赫德日记——赫德与中国早期现代化.北京:中国海关出版社,2005:390、431、441.

[59] 陈炽集.北京:中华书局,1997:96.

[60] 翁同龢日记(第3册).北京:中华书局,1993:1182.

[61] 郭嵩焘日记(第3册).长沙:湖南人民出版社,1982:49.

[64] 中国海关密档(第一卷).北京:中华书局,1990:434.

[65]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(第3卷).484.

[66] 赫德日记——步入清廷仕途.419、322、418.

[67] 赫德日记——赫德与中国早期现代化.2005:474.

[69] [71] [73] [74] 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.北京:人民出版社,1987:308、290、293、275、188.

[70] 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.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(第7编).北京:科学出版社,1958:208.

[72] 严中平.中国近代经济史(上册).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01:211.

[75] 翁同龢日记(第6册).北京:中华书局,1998:3082.

编辑 秦维宪

空、观察历史、进行本专业理论解读的学术流派的专业。

戊戌变法领袖人物梁启超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说过：“海禁既开，所谓‘西学’者逐渐输入，始则工艺，次则政体。”^[1]这是一个中国文化向西方学习的自然流程。以后的流程是：1917年梁启超抛弃了合法国会后，自己也被军阀抛弃。中国引进西方议会制度失败。“五四”前后各种西学流派纷纷传入中国，百家争鸣、新文化运动后，马克思主义占据主导地位，改向学习苏俄体制，国民党学了一半，没有成功。新中国完成国家整合后在建设过程中犯了错误，改革开放后，又转向学习西方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。苏联解体、美国“9·11”事件、次贷危机、国际关系的变化，都影响着中国发展的流程，但我们都未能预测。我们作为历史学的解读，只能站在当代去回顾戊戌变法在中国历史流程中的地位。我们可以确认，由于中国文化的保守性，19世纪的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进度太慢，这是戊戌变法时的基本状态。

人才和素质问题

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，是以天朝上国自居，更是文化上的超级大国。即使欧洲在18世纪上半叶，也还承认中国的文化超级大国地位。欧洲开始轻忽中国，到鸦片战争前，还不到100年的时间。由于中国的自我感觉良好，又与西方缺乏利害冲突，没有必要向西方学习什么。这是长期的优越感形成的文化保守性。鸦片战争后，先进的中国人只是开眼看了看世界，没有看懂差距在哪里，所以，魏源还认为不变者道而已。鸦片战争后的20年间，中国仍然固步自封，也没有向西方学习什么，甚至连先进的武器也没有引进。到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崛起之后，中国才开始搞变革，学习西方。但是，学习的内容有非常大的局限性。李鸿章认为，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，也就是说不必学习，只局限在学习工艺。即使观察西方政治制度的人，也还认为中国古已有之，没有超出中国理想的三代之治的范围。20世纪的中国，一直有人认为东方道德比西方优越。在这种文化保守主义基础上，你怎么能够指望中国有现代化变革的人才储备？

维新变法的第一壮举，就是公车上书，参与人数高达上千人。但这也说明，他们的知识结构是科班出身，年轻时不仅学的是四书五经，而且长期练习的是八股文的应试训练，浪费了青春。维新时期的骨干人物康有为、梁启超都没有到西方留过学，不懂西文，严复的西学水平在当时就是凤毛麟角了。

康有为，1858年生，书香门第出身，叔祖和父亲在太平天国起事后，转入军旅。所以，他也是将门之后，出生于文武兼资的人家。他虽然讨厌八股文（恐怕少年儿童很

少有喜欢八股文的吧？所以，强调不喜欢，没有意义，除非他拒绝八股才有特殊意义，屡试不第的人放弃八股也属正常心态，总要想办法谋生），但还是一直在八股的轨道上运转。1893年考取举人，1895年考取进士。在学术上，先习程朱陆王之学，兼习经世之学。1879年以后，开始接触早期改良派著作。是年游历香港后开始重视西学，读西书译本，但主要精力仍然是研究传统学术文化。1886年曾建议两广总督张之洞组织西学政书翻译，但没有效果。显然，他虽然接触西学比较早，但看不到几本西方政治理论方面的翻译书籍。

梁启超，1873年生，广东新会人，下层耕读世家出身，12岁就中了秀才，1889年17岁时又中了举人。同时研习传统学术，在“训诂词章”方面已经很有修养。1890~1894年间跟随康有为学习，因而得以学习西学和康有为的变法理论。但并没有更好的知识结构，只是因为年轻，传统的包袱更少一点。梁启超真正的西学学习，是流亡日本以后的事。从日本汉字以及日本翻译成古汉语的文献中学习西方理论，他成了中国改革派的理论权威。通过这种途径培养出来的人才，再大的天才，又能真正理解西学到什么程度呢？他们刚刚接触一点西学的皮毛，连怎么操作都不清楚。梁启超后来也一直在民权、立宪、开明专制之间闹不清，更不必说戊戌时期了。

谭嗣同，1865年生于北京，籍贯湖南浏阳。父亲谭继洵是一位保守拘谨的官僚，官至湖北巡抚。他随从父亲做官到了很多地方，阅历广阔，文武兼资，但从小读的是传统的经史之学。他在科举上无所成就，靠父亲的地位捐资为官。学术方向虽然多次转换，但不脱传统范围。直到1890年，他父亲升任湖北巡抚，他也到了武昌，才开始接触西学。因为这里有张之洞提倡洋务的根基。这时他已经25岁了，但在相当时间里，还以为西学“可见西人格致之学，日新日奇，至于不可思议，实皆中国所固有”。^[2]1896年，当谭嗣同拜见翁同龢时，翁认为他“通洋务”。或许谭既懂点西学，又帮助父亲办事的缘故，一次谈话，就给翁留下了这样的印象。从现在看来，他这点西学，搞变法够用吗？

严复，1854年生，14岁时进入福建马江船政学堂，毕业后在军舰上实习，1877年被派赴英国学习海军军事。在英国的2年间，他不仅学习军事，也考察西方社会，阅读社会科学著作。1895年出版了他翻译的赫胥黎的著作《天演论》。但这不是一本忠于原著的翻译译本。以后，他又有一系列的翻译的西书问世。这样的西学人才，已经独领风骚。但要影响社会，还需要有一个过程。我们可以从自己的读书经验中去体会，历史学存在的两张皮现象，是当代人读书的结果。而且，严复本人没有参与变法的实践活动。

袁世凯军政集团的重要骨干唐绍仪，1862年生，广

东香山人，是容闳说服曾国藩，请准清政府选拔的120名留美学生之一，第三批赴美，时间在1874年。1881年，这第一代留美学生学业未成即被全部撤回。唐绍仪在美留学7年，回国时才19岁。唐绍仪当了民国的第一任总理时说：“凡自外洋留学归者，每十年间须复往外国考察一次，仆颇有此志，惜不能达。”^[3]他这样地位的人都做不到10年出国考察一次，整个社会学习西学的水平可想而知。当然，我们的历史学者还需要深入研究这个问题。

康有为在为张之洞写的《上海强学会序》中说：“天下之变，岌岌哉！夫挽世变在人才，成人才在学术，讲学术在合群，累合什百之群，不如累合千万之群，其成就尤速，转移尤钜也。方今海内多故，天子怒焉闵忧，特下明诏，搜求才识闳达及九能之人、一艺之士，而应诏者寡。固搜访之未逮欤？得毋专门之学，风气未启有以致之耶？故患贫而理财，而专精农、工、商、矿之学者无人；患弱而练兵，而专精水、陆军及制造船、炮之学者无人；乃至外国政俗，亦寡有深通其故者，此所关非细故也。”^[4]梁启超在《〈西政丛书〉叙》中说：“旧习未涤，新见未莹，则咸以为吾中国之所以见弱于西人者，唯是武备之未讲，船械之未精，制造之未娴，而于西人所以立国之本末，其何以不戾于公理，而合于我圣人之义者，则瞠乎未有见。故西文译华之书数百种，而言政者可屈指算也。吾既未识西人语言文字，则翘颈企踵仰余沥于舌人之手。一新译政书出，购之若不及。虽然，所译之书，未必其彼中之良也，良矣，译者未必能无失其意也。即二者具备，而其书也，率西域十余年以前之旧书，他人所吐弃而不复道者，而吾犹以为愧宝而珍之。其为西域笑也，固已多矣，又况并此区区者，乃不过燕吴粤一隅之地有通行本，而腹地各省乡僻绩学士，犹往往徒睹目录，如宋槧钞，欲见而不可得。”^[5]也就是说，在戊戌变法的时候，无论是人才储备还是知识储备，都非常匮乏。即使同明治维新时日本的兰学相比，又究竟如何呢？我没有研究，但我们知道大规模的留学活动，还要推迟到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。

在华传教士李提摩太翻译的《泰西新史揽要》是晚清翻译的西方历史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部，1895年出版。费正清主编的《剑桥中国晚清史》评价这本书是“第三流的历史著作中最叫人恶心的渣滓”。^[6]严复的《天演论》出版之后，才有重要的西方社会科学著作翻译出版。因此，戊戌变法的参与者，只能了解一些西学的皮毛的皮毛。

李提摩太评论戊戌变法失败教训说：“惜乎求新首领诸君子，筹之未熟，操之太急，欲将一切旧法全行废弃，而不知调护新旧之间，取旧法之善者，并行而不悖，于是守旧之徒，得以乘间抵隙，以大反其前辙，卒致白云苍狗，变幻纷乘，碧血青磷，赍恨千古。”^[7]张謇是后来立宪运动在国内的领袖，他谈到戊戌变法时的情景说：

“见其（指康有为——引者）仆从伺应，若老大京官排场”，“在京闻康有为与梁启超诸人图变政，曾一再劝勿轻举，亦不知其用何法变也。”^[8]可见，由于现代化人才储备的匮乏，以现代化转型为目标的戊戌变法，是一场缺乏认真准备的政治变革，由于国家危机而仓促上阵。

革命派与维新派是孪生兄弟

老是有人感叹戊戌变法的失败，这不是研究历史的好办法。一个集团在奋斗过程中失败是常事，中国共产党的南昌起义不也失败了吗？戊戌变法的失败，也还不能说明和平变革彻底失败。维新派是一个运动中的政治派系，他们至少还有两次成功的机会。第二次，就是1913~1914年间与袁世凯合作进行变革。第三次，护国战争胜利到粉碎张勋复辟之后，与段祺瑞合作从事变革。在这三次变革时，革命派都没有多少影响力。为什么他们三次都失败？这是一个有连续性的运动，我们不应该孤立地看待戊戌变法。

老是有人感叹辛亥革命破坏了中国社会的稳定。辛亥革命的革命性其实非常有限。辛亥革命加二次革命，不超过半年的战争时间。战斗范围更是非常狭小。比后来的军阀混战要小得多，更不必与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去相比了。辛亥革命在经济体制上更没有任何变革行动，说不上是什么革命。辛亥革命时，除清廷腐败无能，已经无力应对危机外，辛亥革命中的三派系，即北洋派、立宪派、革命派都壮大了，他们之间的三角关系，形似戊戌变法时的放大体。清廷退位的实质，是权臣利用革命派的冲击力，篡夺了清室的权力。日本明治维新也有战争，日本的现代化改革最后是在美军占领下，由麦克阿瑟进行的，以国家的投降为代价。两国的命运，都是错综复杂的过程，很难比较所谓的社会成本。

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运动，实际上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孪生兄弟。至于中国社会的动荡，则是清王朝必然解体的后果。后来梁启超认为，辛亥革命无论有功有过，革命派和立宪派都要负责。

中国社会是救亡激发启蒙。没有甲午战争的失败，就没有维新时期的启蒙。没有抵抗八国联军侵略的失败，也没有整个社会至少在口头上承认全面学习西方的必要。我说的全面，不是指全盘西化，而是指包括军事、文化、经济、政治全方位的学习，而不是仅仅学习技术和军事制度。在这个启蒙的过程中，中国社会直接分裂成了维新派和革命派。他们是学习西方制度时的孪生兄弟。1894年孙中山成立兴中会，1895年举行第一次广州起义。1895年康有为、梁启超发动公车上书，1898年发动戊戌变法。

我们对照一下晚清至民国初年三个政治集团的年龄结构，主要人物的出生年份如下：

北洋派	改良派	革命派
袁世凯 1859年	康有为 1858年	孙中山 1866年
段祺瑞 1865年	梁启超 1873年	黄兴 1874年
吴佩孚 1874年	张君勱 1887年	蒋介石 1887年

上述人物中只是北洋派年长一点。其实，北洋派也在从事变革，并非寸步不进。维新和革命，在上世纪初，存在着此消彼长的状态，他们之间的思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。一般认为，维新派是和平变革派，革命派是武力变革派，但实际上只是50步与百步之差，两者之间在一定条件下多次发生转化。

以维新派论，1898年，康有为、谭嗣同策动袁世凯进行军事政变失败。1900到1901年间，康有为、梁启超发动“勤王”武装暴动失败。1915年，梁启超发动护国战争成功。以革命派论，1912年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，在社会上从事经济建设事业，放弃政治活动，国民党以稳健派为主流派，进行和平变革。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，孙中山解散中华革命军，停止中华革命党的秘密革命活动，从事和平的经济建设。

除了二次革命之外，革命派和维新派既有斗争也有不同程度的合作。以政治思想论，梁启超曾提倡民权，主张政党政治，召开国会，又多次主张开明专制，甚至支持袁世凯为终身总统，其立场摇摆不定。孙中山主张民权主义，但也主张军政时期、训政时期。从行为上看，民国元年孙中山的潜意识是，只要袁世凯开明，独裁一点也无妨，可以维持一个小康社会。孙中山虽然以议会民主为最终目标，但主张以党治国为过渡，这也可以说是以开明专制为过渡手段。

但是，无论和平变革也好，暴力变革也好，维新一立宪派也好，革命派也好，他们都在尝试现代化变革时失败了。即使是北洋派也都失败了。上述三个集团，没有一个集团是成功的。这说明当时中国社会在解体过程中，缺乏社会整合的力量。作为历史，无论那个集团完成整合都不是什么罪过。我们只能在承认这个基本事实的基础上，探讨其社会历史原因。

王朝的崩溃和国家整合

日本和英国，王位没有多少竞争性，日本更是万世一系。中国不同，王朝是周而复始地更新的，所以，野心家也特别多。一个王朝总是要崩溃的。如果现代化转型出现在康乾盛世，那当然是另一种发展逻辑。但戊戌变法出现在王朝末世。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（以下简称曾、左、李）的崛起，凭借的是基层士大夫的力量。但他们也不能不凭借太平天国的冲击力，才得以崛起，进行变革。太平天国的力量发展到哪里，他们的地方势力也发展到哪里。太平天国没有冲击到清廷中央统治，曾、左、李的权

力也只能掌握地方。尽管他们已经掌握了清王朝的主要军事力量，但对中央政治仍然无可奈何，清王朝一度中兴之后，又迅速走向崩溃。曾、左、李的军事变革，更奠定了瓦解清王朝的基础，并演变成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。单纯士大夫力量的集结，挽救不了王朝的崩溃，也阻止不了军阀的蔓延。而且，士大夫本身就分裂成上述三大派系。梁启超和孙中山都以现代化转型为目标，却一直很难精诚合作，无法形成一股强有力的力量。

戊戌至民国初年政治的特殊之处在于，西方先进文化的影响，使中国传统士大夫因应对王朝崩溃的策略而发生变异。他们以为，简单地引进西方政治制度就可以挽救中国社会的解体。因此，他们在政治上的表现非常幼稚可笑，孙中山就是一门著名的大炮，而梁启超一直是单相思，总希望把北洋派带上他的轨道。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是，现代化转型，能不能和平地挽救一个王朝的崩溃？或者说一个崩溃中的王朝，以及解体后的中国社会，能不能和平地实现现代化转型？我们只能承认历史事实，中国文化的保守性和中国传统王朝的崩溃，成了一个死结。因此，事实上没有出现现代化转型和平变革力量的集结。

戊戌维新时期，只是为学习西学（主要是指政治制度和社会科学学说）开了一条门缝。民权、国会一类政治主张，远远没有在社会上普及。随后就是文化的大反动，全面排斥西学，义和团运动的泛滥，就是文化反动的结果。从清廷亲贵到地方士绅，都相信神术可以抵抗列强侵略，抵制西方文化。这种极端的保守势力，不是维新派或革命派摧毁的，而是列强依仗暴力摧毁的。列强迫使清廷清除了保守顽固派，承认学习西方的必要性，这才有了真正公开宣传的立宪运动。但当时中国的国际环境是列强共同控制中国，列强既希望中国变革，有利于列强的商业和投资利益，又不希望中国通过改革而强大起来。中国的复兴运动获得国际支持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分裂的结果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，中国全面地获得了国际的援助。没有列强的分裂，中国就不具备复兴的国际条件。

戊戌变法，是转型中的士大夫企图进行变革，但变革需要动员社会力量。前面说过，单纯的士大夫动员不能够挽救一个王朝的崩溃。而戊戌变法的社会动员，也局限于士大夫。而且，当时的士大夫还没有转向革命。孙中山说，他起初动员革命时，“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”^[9]，因而只能从会党着手。士大夫转向革命，那是在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的事情。贾维先生在《谭嗣同与晚清士人交往研究》一书中分析说：“谭嗣同‘立论处处注射民权’，但在实践中却重视绅权，这种理论层面与实践的差距，是由当时历史条件决定的。他说：‘嗣同尝私计，即不能兴民权，亦当界绅耆议事之权。办其他之事，而不令其人与谋，此何理也？夫苟有绅权，即不必有议院之名已有议院

之实矣。”^[10] 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也主张：“特诏颁行海内，令士民公举博古今，通中外，明政体，方正直言之士，略分府县，约十万户而举一人，不论已仕未仕，皆得充选，因用汉制，名曰议郎。皇上开武英殿，广悬图书，俾轮班入直，以备顾问，并准其随时请对，上驳诏书，下达民词。凡内外兴革大政、筹饷事宜，皆令会议于太和门，三占从二，下部施行。所有人员岁一更换。若民心推服，留者领班。著为定制，宣示天下。”^[11] 这是在为四民之首的士争权利。

民国初年，临时参议院制订第一次正式国会议员选举的法律，参议院多为立宪派人士以及辛亥革命党中的稳健派。他们很关心没有财产的寒士的选举权，而漠视了有财产的商人的选举权。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为商人向参议院说情：“盖现在全球皆注重商战，故对于商人之权利拥护惟恐不周。民国肇造之初，各地商人所受损失为数较四民（指士农工商）独巨，若商人平日所纳捐税均不以直接税论，而只纳有地丁漕粮者独有本款之选举权（指年纳直接税二元以上的人才才有选举权的规定），而商人之权利剥夺靡遗，实不足以维系商情，且与世界潮流相背，揆之立法之意，恐非所宜。”^[12] 参议员们根本不予理会。究竟是袁世凯有现代意识，还是和平改革派参议员有现代意识？我实在说不清楚。社会重士轻商的习性没有改变。当然，在戊戌维新以及民国时期，现代的工商业刚刚开始发育，不可能构成社会变革的关键力量，这也是他们遭到忽视的重要原因。

在这种思维定势之下，能进行理想的现代化转型吗？王朝崩溃之后，能依靠现代化转型进行国家的整合吗？客观进程否定了这种可能性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无论是北洋军阀，还是立宪派，或者革命派，他们都没有获得国家整合的社会力量。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时期，一度获得了很高的声望和权力，但他仍然没有力量整合国民党系统的军事力量，除了黄埔系归他直接指挥以外，其他部队，仍然兵归将有，他是无法直接指挥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他不是不是一个“独裁”者。不是不想，而是不能。最后，中国社会只能从农民中寻找社会整合的力量，在整合成功后再探索现代化转型的道路。这是一个社会力量综合

形成的自然流程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梁启超. 饮冰室全集·专集之三十四·清代学术概论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9：52.
- [2] 蔡尚思、方行编. 谭嗣同全集·石菊影庐笔识（上册）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1：124.
- [3] 访问唐总理记. 民立报. 1912.4.4.
- [4] [11] 姜义华编. 康有为全集（第2集）. 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：192、100.
- [5] 饮冰室全集·文集（第2集）. 63.
- [6] 费正清主编. 剑桥中国晚清史（上册）. 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85：625.
- [7] 转引自熊月之. 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. 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94：612.
- [8] 耑翁自订年谱（戊戌（1898）年六月二日）. 北京：张謇全集（第6卷）. 南京：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94：858.
- [9] 孙中山全集·中国革命史（第7卷）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5.
- [10] 贾维. 谭嗣同与晚清士人交往研究. 长沙：湖南大学出版社，2004：268.
- [11] 康有为全集. 上清帝第二书（第3卷）. 100.
- [12] 大总统不厌再三之读. 申报. 1912.10.31.

编辑 秦维宪



图为北京颐和园西太后软禁光绪皇帝的玉澜堂

唯先 摄